

漆侠 主编

辽宋西夏金代通史



文物考古史料卷



人民出版社

辽宋西夏金代通史

漆侠 主编

文物考古史料卷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宋西夏金代通史·文物考古史料卷/漆侠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01-009405-2

I. ①辽… II. ①漆… III. ①中国-古代史-辽宋金元时代 ②文物-考古-中国-辽宋金元时代 IV. ①K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4121 号

辽宋西夏金代通史·文物考古史料卷

LIAO SONG XIXIA JIN DAI TONGSHI · WENWU KAOGU SHILIAO JUAN

漆 侠 主 编

策划编辑:李 斌

责任编辑:李 斌 张 旭

封面设计:张 婷

出版发行:人 民 出 版 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 65250042/65289539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3

字 数:215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09405-2

定 价:30.00 元

前 言

邓广铭先生在生前曾经设想过大型辽宋西夏金断代史的编纂，并且向相关出版社推荐由漆侠先生主持此项工作。

已故的漆侠先生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辽宋西夏金史研究的泰斗。漆侠先生生前制定了主要的编写框架及方案，向教育部申请辽宋西夏金大型断代史的课题，并且得到了批准和拨款。他不幸突然辞世以后，我们经过认真商议，决定继承漆侠先生的遗愿，勉力完成此项工作，希望该部断代史能成为 21 世纪初辽宋西夏金史研究的继往开来之作，并仍由本课题的创导者漆侠先生作为主编，这应是对漆侠先生毕生事业的最好纪念。

漆侠先生笃信马克思主义，自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他留下了大量相关著作和论文，如《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辽夏金经济史》、《两宋政治经济问题》、《求实集》、《知困集》、《探知集》、《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历史研究法》等，都表现了他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创见，构架了自己的辽宋西夏金史研究理论体系。

漆侠先生主张，“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它的指引下，才能在广度和深度上占有更多的材料，抉发材料的涵义和实质，揭示材料的内在联系及其演变形态，得出合乎事物实际的结论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绝不意味着不重视史料，而应是史论结合，将理论分析融会于史实论述之中。“要想研究前人研究过的题目，你至少在占有材料方面要远远超过前人。不然，便会成为辕下驹，为前人的见解所局限。”^①“把传统的考据方法加以汲取，融化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考据方法的关系是紧密结合着的。”^②

他尤其注重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认为一切社会现象无不根源于此。“政治

① 漆侠：《关于宋史研究》，《漆侠全集》第 8 卷，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90 页。

② 漆侠：《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漆侠全集》第 9 卷，第 101 页。



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一致、上下贯通的。”^①“古代经济史是一门基础性质的学科。只有对各个时期的经济制度有了比较透彻的研究，才能对各个时期的上层建筑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有所了解和认识，并最终达到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②他认为研究历史，必须关照现实，贯通古今，如此等等。

漆侠先生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不能亲自主持此项工作。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也绝不是空头主编，而是名实相符的。辽宋西夏金的研究，从理论体系到许多具体观点的阐述，从研究方法到许多具体史料的运用，在他生前的著述和言谈中，都已经作了系统的、丰富的表述，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本书将在基本的、重大的学术体系和见解方面，采用主编漆侠先生之说。

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本书对于不同的、重要的学术见解，将在正文或注释中作适当的介绍。

中国古代史学创造了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体裁，这些体裁曾对古代史学的发展和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到了20世纪，此类体裁已显得陈旧和过时，不能适应新史学的发展需求。20世纪的前辈学者改用了诸如论文、专著、专史、断代史、通史等新体裁，藉以表达新史学的研究成果。

随着史学的演进，史学体裁也将不断地丰富、改进或创新。我们认真地研究了近年出版的若干通史、断代史在体裁运用方面的得失，考虑到作为一部大型断代史反映现代研究成果的实际需求，决定将本书分为政治军事卷、典章制度卷、社会经济卷、教育科学文化卷、宗教风俗卷、周边民族和政权卷与文物考古史料卷，共计七卷，各卷分设章和节。希望通过七卷的分别论述，力争对辽宋西夏金代史作出立体透视和全息摄影式的研究。当然，依七卷的内容，分国叙述，也并非无利弊得失可议。至于仿效古代的纪传体，设置一批名人的简单传记，似不一定是大型断代史必备的体裁。

中国是个大国，各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自古迄今都是不平衡的。各代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研究，其实是断代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理应纳入断代史的论述之中。由于史料方面的局限，本书主要对宋朝的地方政治、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有所阐述。全书既是统一的整体，各篇章又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对相关联的部分也有所交代。

① 漆侠：《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漆侠全集》第9卷，第142页。

② 漆侠：《漆侠全集》第8卷，第288页。

附：关于本书引用文献格式的几点说明

1. 本书引用的“二十四史”，均为（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繁体竖排点校本，文中恕不再逐一注明出版信息。
2. 本书引用宋朝和当代人论著，一般不再另注作者时代。
3. 本书引用古籍文献，一般使用全称，但表格中偶用简称。
4. 本书引用古籍文献和现代著述，在各卷首次出现时注明作者和版本信息，以后出现时一般不再注明。

目 录

第一章 文物	1
第一节 辽朝文物	1
一、辽朝的石窟、碑刻	1
二、辽朝的工具、武器和生活器皿	4
三、辽朝的艺术品	6
第二节 宋朝的文物	7
一、宋朝的铜镜	7
二、宋朝的货币	9
三、宋朝的书画	12
四、宋朝的书法与碑刻	15
五、宋朝雕塑	19
第三节 宋朝的古迹	22
一、宋朝的寺观殿宇	22
二、宋朝的古塔	22
三、宋朝的桥梁	24
四、宋朝的地道	25
第四节 西夏的文物	26
一、西夏寺庙	26
二、西夏古塔	26
三、西夏石窟	27
第五节 金朝文物	28
一、金朝玉器	29
二、金朝铜镜	30
三、女真文碑刻	31



第二章 考 古	34
第一节 辽朝的考古	34
一、辽朝的城址	35
二、辽朝墓葬	45
三、辽朝的手工业遗址	54
四、现存宗教建筑遗址	58
五、辽朝考古中新技术的应用	63
第二节 宋朝的考古	64
一、城址的考古与勘探	64
二、宋朝陵墓的考古与发掘	68
三、制瓷业的考古与调查	73
四、其他遗址的考古	79
第三节 西夏考古	81
一、西夏皇陵	81
二、其他地区西夏墓	83
三、黑水古城	83
四、高油房古城	83
五、省嵬城故址	84
六、韦州古城故址	84
七、贺兰山西夏遗址	84
第四节 金朝考古	84
一、金朝的城址	85
二、手工业及农业遗址	91
三、金朝墓葬	94
四、宗教建筑及其他建筑遗址	101
第三章 史 料	104
第一节 辽、宋、金朝基本史料	104
一、《辽史》、《宋史》、《金史》	104
二、《宋会要辑稿》	112
三、《续资治通鉴长编》	113
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115
五、《三朝北盟会编》	117

六、《文献通考》	118
第二节 辽、宋、西夏、金重要史料	120
一、辽朝重要史料	120
二、宋朝重要史料	126
三、西夏重要史料	143
四、金朝重要史料	158
第三节 一般史料	162
一、辽朝一般史料	162
二、宋朝一般史料	163
三、金朝一般史料	169
附 录 古今地名对照表	171
后 记	192

第一章 文物

辽、宋、西夏、金朝遗存至今的文物古迹数目很大，颇为分散，其中不乏引人注目的精品名址，这在本书前面的多幅插图和有关章节中，已有介绍。本章将对辽、宋、西夏、金的文物古迹作些系统性的概述。

第一节 辽朝文物

自近代以来，随着俄、英、美、法、日列强相继在中国进行所谓的探险活动，一些独具特色的辽朝文物逐渐为世人所知。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对一些辽朝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伴随着一批重要文物的发现和出土，丰富了辽朝的文化内涵。

关于遗留至今的辽朝建筑、墓葬、手工业和宗教方面的遗址，因在考古部分中有的已经作了介绍，故下面只对现存的石窟、典型的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以及艺术品及其研究状况进行概述。

一、辽朝的石窟、碑刻

(一) 石窟

由于辽朝契丹族统治者崇信佛教，兴建寺院，开凿了大量石窟，其中著名的石窟有上京的真寂之寺（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东北群山中，距上京城址约 20 公里，通称后召庙石窟）、云门寺石窟（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城址北 25 公里处）、开化寺石窟（在真寂之寺东 2 公里宝顶山东侧，俗称前召庙）^①、东京的庄河千佛洞（今辽宁岫岩县庄河陶家屯）、中京的灵峰院千佛洞和福峰山石窟及西京的云冈石窟^②等，但目前保存下来的不多，大多窟内已经空空如也，没有造像。其中现存较为完整的上京真寂之寺将在第二章

① 李逸友：《内蒙古巴林左旗前后召庙的辽朝石窟》，载《文物》1961 年第 12 期。

② 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二六），载《北京大学学报》1956 年第 1 期。



考古部分作详细介绍，下面把中京的灵峰院千佛洞、福峰山石窟作一简单介绍。

灵峰院千佛洞^①，在辽中京松山州的遮盖山，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牛营子镇西北5公里。又称“洞山”、“灵峰寺”、“遮盖山石窟”。有主、环二洞，主洞与环洞的洞口用石条砌成圆拱门。在主洞门顶嵌有“灵峰寺”三个字。主洞成凸形，由左右耳室和前后室组成，洞长144米。后室中央石刻释迦牟尼佛像，盘坐于莲花台上。环洞分右左后三面包围主洞，洞宽约2.7米、高约2.5米、全长20米，壁刻菱形像龕1080个，每龕原来当刻一佛像，现已不存。洞内有金、明、清重修碑四块，据已经毁于“文化大革命”的金皇统三年（1143）的《灵峰院千佛洞碑》记载，此石窟凿于辽朝乾统二年（1102），为辽朝晚期石窟。

福峰山石窟，位于辽中京西南60公里的山中，即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里河川深谷中，俗称喇嘛洞山。石窟开凿于山之东麓，有风洞、响洞等十余处，其中响洞开凿别致，呈长方形，高2米多，长4.7米，宽5.6米，外观似蒙古包，入洞后犹置身于帐幕之中。石窟附近原有遗址多处，山谷中有大型辽墓，出土过汉、契两种文字的碑刻，当是后族墓地^②。

（二）碑刻

辽朝现存的碑刻大多为墓志铭、寺院碑、记功碑、名衔碑、佛经和摩崖石刻等，从文字来看为汉文和契丹文两类，其中契丹文又分为大字和小字两种。

1. 汉文碑刻

墓志铭，包括辽帝后的哀册和契丹汉人贵族的墓志铭、石棺记、神道碑等。著名的辽帝后的哀册（汉文和契丹文两种）为新中国成立前被盗掘的庆陵中发现的圣宗、兴宗、道宗及皇后的哀册，均呈正方形，两石为一合，现有两种文字的15方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辽朝的墓志铭面世的数量众多，形制多样，风格各异，内容丰富，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近年来出土的著名墓志铭有《陈国公主墓志铭》、《耶律羽之墓志铭》和以韩匡嗣为首的韩氏家族墓志铭等；石棺记亦属于墓志性质，一般文字较少，如保存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博物馆的《夏蕴石棺记》；神道碑为立于墓前地面的碑铭，著名的是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西桥乡鸽子洞沟耶律琮墓地的神道碑^③。

① 李逸友：《赤峰洞山辽朝石窟寺调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② 赤峰市文化局、博物馆编：《中国内蒙古赤峰市文物古迹博览》，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③ 李逸友：《北方考古研究》（一），中州古籍出版社，第267—276页。

寺院碑，包括有寺庙碑（寺碑、寺记、庙碑等）、塔记（塔铭、造塔记、建塔记等）、经幢记（造经记、石幢记、造像记）等。其中，寺庙碑有立于应历十年（960）的《三盆山崇圣院碑》（现立于北京房山区周口店东厂村鹿门峪）和《重修云居寺壹千人邑会之碑》（位于北京房山区云居寺北塔碑廊）等，塔记有20世纪发现于北京房山区云居寺南塔旁的《石经寺释迦佛舍利塔记碑》和《大王镇罗汉院建八大灵塔记碑》（现藏于北京平谷区黄花峪乡黑豆峪村碑林）等，经幢发现的较多，如藏于北京房山区云居寺的建于应历五年（955）的《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和藏于北京陶然亭慈悲庵文昌阁前的建于寿昌五年（1099）的《故慈智大德佛顶尊圣大悲陀罗尼幢》^①等，属于此类的还有著名的《秦王发愿纪事碑》^②。

记功碑，据《辽史》记载，在祖州城内树有辽太祖记功碑，在州城内发现有契丹大字碑残块，当是此碑被毁后的遗留。

名衔碑，主要以列人姓名，以昭盛德内容的碑刻，如中京大定府的开泰寺《捐施衔名碑》和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大罕山出土的《崇善碑》^③等。

石刻佛经，北京房山区云居寺以藏于古代石刻佛经而闻名于世，刻经事业始于隋大业年间，一直到明天启年间，辽朝的刻经在云居寺刻经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补刻了唐碑的残损部分凡80卷，又续刻了新经120卷左右，及辽晚期又增刻了大碑1000多版，160余种经；小碑4000多版。这些石刻经文不仅在研究我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也为辽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摩崖石刻，多为一些石刻题记，散见于辽境内各地。如位于北京房山区上方山云水洞的辽乾统六年（1106）石刻题记^④、赤峰市东郊水地乡“五佛二龙山”上的题记以及克什克腾旗百岔河流域榆树林子村北的石刻题记等。

2. 契丹文碑刻

如前所述，契丹文的碑刻分大字和小字两种，是研究契丹语言和文字、补《辽史》之不足的珍贵资料。

契丹大字的碑刻主要有墓志、寺庙碑和器物铭文，墓志著名的有《萧孝忠墓志铭》、《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萧袍鲁墓志》、《耶律习涅墓志》、

① 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146、168、174页。

② 陈育宁：《记辽朝石刻秦王发愿纪事碑》，载《文物》1966年第4期。

③ 苏赫：《崇善碑考述》，载《辽金史论集》第3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4页。

④ 《北京辽金史迹图志》，第139页。



《故太师铭石记》、《耶律祺墓志铭》等；寺庙碑有《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等；器物铭文有太傅银匕铭文、铜印铭文和石印铭文等。

契丹小字的碑刻主要有哀册、墓志以及题记等，哀册即上面所述出土于庆陵中的，目前保存下来的有《兴宗哀册》、《仁懿哀册》、《道宗哀册》、《宣懿哀册》等；墓志有《萧令公墓志》、《许王墓志》、《故耶律氏铭石》、《耶律仁先墓志》、《耶律（韩）敌烈墓志铭》等；题记是指在壁画和器物上的题字，如庆陵的东陵壁画上的题字、翁牛特旗广德公出土的木椁壁画上的题字等。

二、辽朝的工具、武器和生活器皿

由于辽朝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政策，各民族“各安旧风，徂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反映在出土的工具、武器和器物中，就是出土了很多辽朝独有的文物，具有明显的游牧特色。

在出土的辽朝文物中，有为数众多的生产生活工具，农具类：有铁制的犁铧、锹、锄、斧、凿、钎、叉、镰、铡刀等。生活用品类：有铁制的锅、铲、熨斗、剪等，铜制的镜、盆等，陶瓷器有瓮、罐、杯、盆、盂、碗、碟、盘、瓶、壶等，木制的有箸、桌、椅、凳子、算筹等，还有纺织品类的绢、绫、绮、锦等，以及金、银、琥珀制奢侈品。武器类：剑、刀、弓、箭镞、骨朵、锤等。娱乐类：有坝、围棋、双陆、投壶等。还有一些明显具有游牧特色的物品，一类是骑射用的马具：马镫、马鞍、马鞭、马衔、警饰、带扣等，这类物品多出土于契丹人墓葬中，如在著名的驸马赠卫国王墓^①和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②中都出土了成套的马具，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右中旗巴扎拉嘎辽墓中也出土了实用的马具^③，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岗台乡道尔其格辽墓中出土了一具较为完整而且实用的木制马鞍，在温都尔敖瑞山的辽墓中出土了鍍金的马鞍^④。另一类是从事渔猎活动的用具，也多出土于契丹人墓中，在有的契丹人墓的壁画中也有反映，如刺鹅锥、鱼叉、冰穿、鱼钩、扁鼓、锤（铜制或滑石制）等^⑤，其中除锤外，均是与契丹皇帝“春捺钵”有关的器物。在陈国公主驸马尸体腰

① 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②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7年第11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③ 苏日泰：《科右中旗巴扎拉嘎辽墓》，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第2期。

④ 丛艳双：《阿鲁科尔沁旗辽朝遗迹述略》，载苏赫主编：《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248页。

⑤ 徐秉琨：《契丹族猎具》，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2期。

的银带上悬佩一件玉柄银锥，做工考究，通长 17.8 厘米，玉锥柄为青玉磨制，圆柱形，锥体末端嵌入玉柄中。鍍金银鞘用长条薄银片打制卷曲成筒形，合缝处焊接，鞘上部系银链^①。此即“春捺钵”时刺天鹅用的刺鹅锥。这些器具的出土为复原辽朝契丹、汉、渤海等人的生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辽朝的陶瓷器是中国古代陶瓷中的一朵奇葩，尤其是“辽三彩”世界闻名，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辽朝的陶瓷器中有很多器物是辽朝所独有的，最能反映契丹人习俗和特点，如鸡冠壶、牛腿瓶、凤首瓶、盘口瓶（长颈瓶）、暖盘、三彩海棠盘、方盘、各类玩具，以及双系壶、执壶、注壶等。

关于鸡冠壶的名称，顾名思义就是因为壶的上半部分形状似鸡冠而得名，是由日本人在 1933 年最初命名的。新中国成立后，有人称皮囊壶，有人称马镫壶，也有说是马孟的^②。根据研究，鸡冠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称 A 型：单孔式，有两个亚型。其中 Aa 型，正视上窄下宽呈梯形。此型由早至晚的变化趋势为壶口由粗变细、口耳之间的空隙渐宽、腹壁由斜直转为弧曲，较早的以驸马卫国王墓出土的为代表，较晚的以辽宁义县清河门 M4 出土的为代表，时间由辽世宗至圣宗时期；Ab 型，正视上下相若近长方形，较早的代表为沙沟子 M1 出土的，年代与驸马卫国王墓相当，器形平底，上扁下圆，两侧起棱形成三角革带痕。较晚的代表为巴拉嘎墓出土的，圈足，腹身较浑圆，仿皮条装饰已经消失。时间相当于辽世宗至圣宗时期。B 型：双孔式，器形由上部两孔处一高一低形成两个驼峰状，上薄下厚，整体侧视呈三角形，上部两孔处平齐呈凹字状，整体侧视呈近长方形变化，时间相当于辽景宗至圣宗太平年间。C 型：提梁式，器形呈腹身逐渐消瘦，由垂腹至鼓腹最后变成筒腹的变化趋势，时间相当于辽兴宗重熙年间至天祚帝时期^③。

三彩鸳鸯注壶是辽三彩中的珍品，出土于内蒙古赤峰王家店，在辽宁凌源义和房也有同式注壶出土。此壶通高 20 厘米，造型为浮水鸳鸯。鸳鸯背有一喇叭状五瓣花形壶口，口的后部连接尾羽为一弧形把，头部昂起，冠羽上耸，两眼外凸，凝视前方，嘴部中空与腹部连接为流，平底，腹部下为莲叶，下有素面假圈足。通体满印羽毛状纹饰。粉红色陶胎，施白粉衣，挂黄、绿、白三色釉，器底、器里无釉。鸳鸯悠闲安适，栩栩如生。造型虽基本取法于唐三彩的

①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7 年第 11 期。

② 玛希、张松柏：《马孟考》，载《松州学刊》1987 年第 4、5 期。

③ 杨晶、乔梁：《辽陶瓷的分期研究》，载吉林大学考古系编：《青果集》，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2—390 页。



鸳鸯壶，但保留了契丹族传统皮囊壶的痕迹^①。

三、辽朝的艺术品

辽朝的艺术品流传下来的很少，因此就显得弥足珍贵。因为雕塑和书法方面前面已经有介绍，所以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出土的绘画方面艺术品。

辽朝传世的绘画作品不多，如胡瓌的《卓歇图》、耶律倍《射骑图》、《人骑图》等。这里只就出土的绘画艺术品做一下介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墓中的壁画，一类是出土的绢画。

（一）壁画

如前所述，辽墓中的壁画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日本人于庆陵中就有发现，新中国成立后文物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发现了很多壁画。这些壁画不但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民族、民俗及人类学价值，而且还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壁画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类：游牧生活图、车骑出行仪仗图、奴仆侍宴图、神兽祥瑞图和山水花鸟图。早期辽墓中的壁画多以游牧生活和当地的自然风光为主题，装饰性很强，典型的代表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的石棺画。壁画的技法一般是在白灰壁面或平整的木椁上作画，先用墨线勾勒或用针锥刻画线条轮廓，然后着色。或先用淡墨起稿，再用浓墨重提。设色以平涂为主，也间用晕染法。色调以朱红、赭白、杏黄、草绿为主。大多是出自民间画师之手。一般来说，原辽上京、中京之地的壁画题材多自然风光，西京、南京之地多以文人逸事等汉族传统题材为主，反映出壁画内容有明显的地区性。庆陵中的壁画以水平高、内容丰富闻名于世，其中的四季山水图，与辽朝皇帝四时捺钵相联系，是辽墓壁画中的珍品。

（二）绢画

1974年在辽宁省铁岭法库叶茂台的第七号辽墓中出土了两轴绢画，一幅是山水画，后名为《山弈候约图》（有的又称《深山会棋图》），另一幅是花鸟画，后名为《竹雀双兔图》。两幅画原对挂在棺床小帐内东西二壁的南端，前者在西，后者在东。发现时画已经脱落在棺房的木板上，壁上挂画的铁钉仍在。两幅绢画在地下历经千年，出土时还基本完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山弈候约图》，长1.54米，宽0.55米。画面构图是峰峦叠嶂，林木繁茂，山庄楼阁，峡谷清幽。阁前有二人对弈，一人观棋，山下有一高冠士人携杖登

^① 宋桂云：《辽三彩——龙纹执壶和鸳鸯壶》，载《文物通讯》1979年第7期。

临，后随二童，前者背上负有盛物行囊；后者肩上扛着罩衣古琴。下部还绘有山石溪水，青苔小草等。充分反映出封建时代文人隐士幽雅生活的主题。

《竹雀双兔图》，长 1.06 米，宽 0.54 米。画面绘有竹丛，在三竿竹上落着三只麻雀，动式各异，有的寻觅食物，有的静立下观，有的自理羽毛。竹丛下有三株野花，左为蒲公英，中为地黄，右为白头翁。在野花前草地上绘有两只灰兔一只在吃草，一只在探望，神态逼真。

由于两幅画上既无作者名款，也没有题识和收藏印记，故只能从绢画本身进行分析研究。据杨仁恺先生研究，由于画幅出土于可以断定是辽朝早期的墓葬之中，故绢画最晚不能晚于辽景宗耶律贤时期，而上限可早到五代。关于画的作者族属问题，《竹雀双兔图》是“侧重出自契丹族画家之手”^①。

第二节 宋朝的文物

一、宋朝的铜镜

宋朝的铜产地主要分布在南方的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和西南的四川。依《宋会要辑稿》卷三五《食货》所记，韶州岑水场、中子场产铜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88%。所以，宋朝的铸镜业也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湖州（治今浙江湖州市吴兴区）、苏州、衢州、明州、常州、秀州、婺州、袁州、临安（今浙江杭州市）、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县）、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市）、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及长江中上游的成都（今四川成都市）等地。其中以湖州尤为著名。此时的湖州，铸镜商号店铺林立，工匠众多。其制品大多专注实用，不尚花纹，产品销路极广，产量也较大。至今，从巴山蜀水到漠北草原，均有湖州镜出土。

1. 宋朝铜镜的特点

北宋初期，铜镜的铸造仍保留着唐朝遗风，图纹线条较粗。自宋哲宗元祐年（1086—1093）以后，铜镜的形制和纹饰都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宋镜自己的特色：

一是造型多样。除常见的圆形、方形、亚字形、六弧葵花形、六瓣菱花形外，还出现了长条形、桃形、鼎形、钟形、瓶形等形状，以及带柄镜等。二是图案题材趋同。在有图案的种类中，以缠枝花草为多，还有一些神仙人物故事。前者纹饰纤巧，手法精细，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堪为宋镜之杰作。后者以

^① 杨仁恺：《叶茂台第七号辽墓出土古画考》，上海美术出版社 1984 年版。



粗线条的浮雕技法处理，纹饰呈现一种超尘脱俗的神仙意境。总的来说，宋朝的铜镜装饰艺术较之前代趋于衰落。三是出现了大量以商标字号为内容的题记铭文。四是铜镜胎壁趋向轻薄；胎质的合金成分与汉唐相比有明显的变化，锡的含量下降，铅、锌的含量增加。

2. 宋朝铜镜的类型

依据目前考古发掘和传世铜镜资料，大致可将宋镜纹饰划分为9类。

一是素面镜。镜背面光素无纹饰，个别在镜背素地上铸出几道弦纹。

二是缠枝花草纹镜。主题纹饰为各种不同形式的花枝、花瓣，多采用单线白描，用线雕技法处理，弱枝细叶相互盘绕，形成纤巧秀隽的图案。

三是花鸟镜。主题纹饰多为双凤、双鸾、双雁、鸳鸯等，口衔花枝，或两两相对，或回旋飞翔；也有四凤、四雁的起飞。它们造型上借鉴民间剪纸、刻纸手法，十分生动。

四是神仙人物故事镜。这些题材有龟鹤齐寿、仙人驾鹤、人物楼阁、钟馗捉鬼等。

五是蹴鞠纹镜。此镜为圆形。主纹饰铸为高浮雕的形式。画面上一男一女蹴鞠（踢足球），男子头戴璞头，身着长服防守。一女子高髻并发，身着长衫进攻，小球悬于女子脚尖之上。他们侧后有一持铃男子和腰束百褶裙的女子观看。背景为浮云、草坪和假山石。

六是航海图镜。菱形。画面海浪翻腾，鱼龙出没，海船破浪向前。有的镜上端正中铸有“煌极昌天”（或煌丕昌天）四字。^①

七是八卦纹镜。主体纹饰有八卦、八卦四神、八卦十二生肖等多种。

八是吴牛喘月纹镜。图案绕钮配置，钮上方有浮云和圆月，月内多铸有铸镜者的姓；钮两侧是花株和芦苇；钮的下方一水牛卧于岸上，惊恐地回首仰望空中皓月，身旁水波荡漾。

九是商标铭记类镜。铭文绝大多数为商标铭记，格式一般都是先标明州名，再标明姓或姓名，有极少数铭文还标明店址；最后是“照子”或“照子记”字样。它们多置于镜钮一侧的方格内，带柄镜则在镜背中心部位。铭文有“湖州真石家炼铜照子记”、“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及“饶州上巷周家久炼青铜照子”等。

根据产地又可分为：湖州镜、饶州镜、建康镜、成都境、苏州镜、杭州镜。

^① 高西省：《论中韩两国出土的航海图纹铜镜》，载《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